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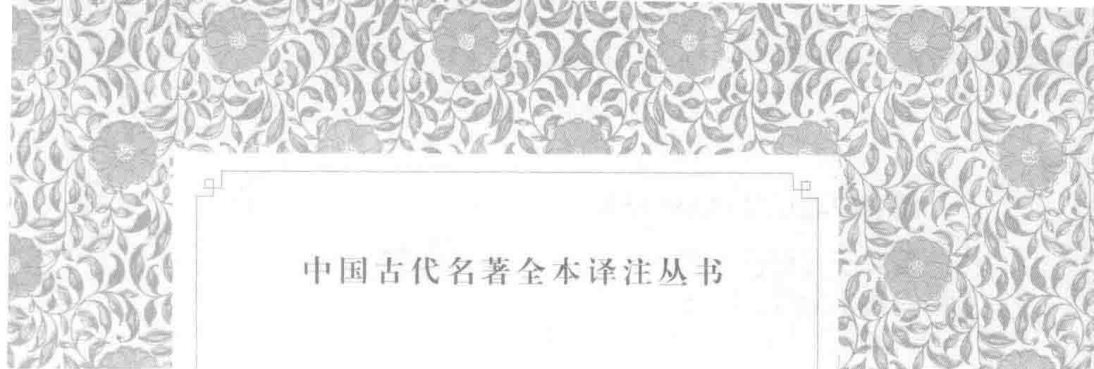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穆天子传
燕丹子

译
注

王天海 译注





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穆天子传
燕丹子

译
注

王天海 译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天子传译注 燕丹子译注 / 王天海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1

(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ISBN 978-7-5325-9034-6

I. ①穆… II. ①王…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集—中
国—先秦时代②《穆天子传》—译文③《燕丹子》—译文

IV. ①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4473 号

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穆天子传译注·燕丹子译注

王天海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5 字数 156,000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9034-6

I·3335 定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总目

穆天子传译注 1

燕丹子译注 197

穆天子传译注



前言

《穆天子传》是一部奇书，更是一部珍贵的历史古籍。说它奇，是因为它所记述的西周中期周穆王远征西域的事迹具有浪漫、雄奇的色彩；说它珍贵，是因为它长埋地下数百年^①，是汲冢竹书中唯一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令人遗憾的是，汲冢竹书由于盗墓者的损坏、地方官府的收藏不慎，虽经西晋时饱学之士荀勖等人整理、编校，留下的仍然是残阙之文。所幸的是，《穆天子传》毕竟是其中“差为整顿”的一种^②，又赖晋人郭璞作注，故能流传到今天。

《穆天子传》自郭璞作注后，冷落千有余年，方有清人檀萃为之注疏^③。此后，清末至民国时期，研究《穆传》一时兴起了热潮，中外研究者不下数十家。新中国成立后，自顾颉刚、岑仲勉二先生著文研究以来，四十余年间，专门论述《穆传》的文章也有二十余篇。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贻樑、陈建敏的《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一书，可以说是对《穆传》研究前所未有的—次“总帐式整理”^④。它的价值不仅在汇诸家之校，集前贤之释，更在于随处可见作者新颖、独到的见解与思索。但是，迄今为止，《穆传》研究中仍存在着不少疑难问题，未能寻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只有期待地下文物的发现，也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才能使《穆传》研究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在这里，笔者拟在前人整理研究《穆传》的基础上，略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穆天子传》的出土与整理

据史书载，西晋初年汲县人不（fǒu）準盗发了战国时魏襄王的古墓（一说为魏安釐王墓），其中有大量的竹简古书，后被西晋

官府收藏。这批书被后人称为“汲冢古文”。关于汲冢竹书发掘的具体时间，晋代王隐《晋书》有两种说法^⑤：在《武帝纪》、《束皙传》中称太康元年（280）；但在《荀勖传》中又称太康二年（281）。唐修《晋书》则有三种说法^⑥：《武帝记》作咸宁五年（279）；《律历志》作太康元年；《束皙传》作太康二年。雷学淇曾在《竹书纪年考证》中折衷其说，认为言咸宁五年者，或取盗掘之岁；言太康元年者，或取收书之年；言太康二年者，或指校理之秋。王隐《晋书》早已亡佚，其说散见于他书所引，难以为据。唐修《晋书》三说不一，《武帝纪》作咸宁五年，未见所本；《律历志》作太康元年，恐怕亦受王隐《晋书》影响；《束皙传》作太康二年，正与荀勖《穆天子传序》所载相合。荀勖亲自参加校编这批汲冢古书，他在序中说：“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⑦这应是确实可信的记载。又考晋太康十年三月，汲令卢无忌所立的太公吕望碑，其上镌文所记发冢事正与荀勖序所言岁时相同。因此，汲冢古书出土的时间可以确定为晋太康二年（281）。《穆天子传》正是这批古书中的一种。

《晋书·束皙传》里记载了这批古书的详细目录，现摘录于此：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

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詮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求指归，而以今文写之。哲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⑧

东晋王隐《晋书·束皙传》所载又与此略异：

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三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事，今谓《穆天子传》。此四种差为整顿……《穆天子传》世间偏多。^⑨

以上所引使我们知道《穆天子传》最初编校时题名为《周王游行》，只五卷，经荀勖再次校定后即已改名为《穆天子传》，决非王隐时方有此名。这从荀勖的上奏序文可知。在所编校整理的《杂书》十九篇中，另有《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篇，时人以为既属穆王事，便取之附于五卷之末，由郭璞一并作注，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六卷本《穆天子传》。自《隋书·经籍志》著录《穆天子传》六卷以来，历代史志书目皆有载。除《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外，此前一直列在史传类。

二、《穆天子传》成书年代与作者

关于《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与作者，历来众说不一，至今尚无确切的结论。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四种说法：

一是以清人姚际恒为代表的汉以后人伪作说。其说见他的《古今伪书考》：“《穆天子传》本《左传》、《史记》诸说以为说也，多用《山海经》语，体制亦似起居注。起居注者，始于明德马皇后，故知为汉后人作。”^⑩今人童书业在《穆天子传疑》一文中亦认为“《穆天子传》为晋人杂集先秦散简，附益所成。其间固不无古代之材料，然大部分皆晋人杜撰之文”^⑪。因汲冢古书的出土为史所明载，故疑古派的“汉后人伪作”一说，早不被学术界所赞同，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疑难，尚未能得到完满的解答，存在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是西周史官实录说。此说实始于《隋书·经籍志》，明人胡应麟据此在《四部正讹》中说：“《穆天子传》六卷，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型范，盖周穆史官所记。”^⑫民国时，顾实有《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一书，力主此说。其后岑仲勉、常征、孙致中、卫挺生诸人皆以翔实的考证支持此说。故此说的影响甚大，赞成者颇多。

三是成书于战国说。至于作者，则又有中山人、赵人、魏人等不同。清人王谟怀疑“战国时人因《列子》书《周穆王篇》有驾八骏宾西王母事，依托为之，非当日史官起居注也”^⑬。民国时，此说以卫聚贤的《穆天子传研究》为代表，他认为《穆传》成书于战国时代，作者为中山国人。解放初期，顾颉刚先生有《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一文^⑭，亦考定《穆传》成书于战国，认为作者是赵武灵王之后人。今人靳生禾先生亦著文赞同顾说^⑮。今人钱伯泉在他的《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一文里肯定地说：“《穆天子传》一定出于战国时期的魏国文士之手。”^⑯今人缪文远、王贻樑

等均持此说。

四是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之说。此说由今人王范之先生提出，他在《穆天子传所记古代地名与部族》一文中考定说：“《穆天子传》的成书时代，大约是《春秋》成书以后，《左传》成书之前。那即应是在春秋末战国初的时代里。”^⑩至于作者，则未言及。

对于上述诸说，笔者认为《穆传》为西周时史官所作更为合理一些。首先从其语言文法看，《穆传》行文古朴，全不类《春秋》、《左传》、《国语》、《国策》、诸子之文，而与《尚书·周书》中与周穆王直接有关的《君牙》、《冏命》、《吕刑》三章的文风、词语多有相合之处。二是观《穆传》所记名物制度，邦国人名，皆非春秋战国之时所有，而只能出现于西周时期。这些已有学者通过翔实的考据予以证明。三是《穆传》所载礼制与历法，决非春秋战国时所行。特别是传中所记时序，皆用周正，以建子之月为岁首。这更有力地证明了《穆传》成书在西周，而不在已改用夏正的春秋战国之时。关于这一点，顾实曾在《读穆天子传十论》及《穆王西征年历》二文中专有论述，此不赘引。四是《穆传》中载引诗歌，决非战国时人所能为。如卷三中穆王与西王母唱和之诗，卷五中又有穆王所作三章哀民之诗。这些诗虽不见于《诗经》所载，但其文法皆与西周之诗无异。《穆传》中的诗歌也只能是西周时的作品，《穆传》非战国时人所为，其理亦明。

反对《穆传》成书于西周说者，曾提出这样的疑问：西周都城宗周本在镐京，为何穆王西征要绕道今河南、山西，出雁门进入阴山河套后再渡河西去呢？如果承认《穆传》中宗周在洛邑，就无法坚持成书西周说，因为据文献所载，周幽王之后，洛邑始称宗周。为释此疑，岑仲勉、常征二先生仍主宗周为镐京，并不惜改变穆王西行路线以成此说。这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西周时宗周是否已移洛邑？今人卫挺生在他的《穆天子传今考》一书中说：

挺为彻底解决此一问题，乃努力金文之断代研究，而藉知

周自穆王初年，政府已迁洛邑办公。“周”与“宗周”之名，随政府而移洛。洛邑之王城始称“宗周”，洛邑五六十里内外之东郊专称“成周”。^⑮

如此说成立，便可证明《穆传》中“宗周”即洛邑，而不在丰、镐。那么，周穆王西行就不存在绕道之疑了。但此仅为一家之说，尚待学术界认同。至于《穆传》作者是否为穆王西行侍从史官，或是其后史官？尚有待于地下出土文物方能证实。总之，《穆天子传》应当是西周时期的作品，作者有可能是周穆王身边记事史官，也可能是穆王身后之史官。

三、《穆天子传》的内容和性质

《穆天子传》于汲冢出土后，虽经荀勖等人精心整理编校，终因盗墓者的损坏，难以恢复其旧貌，只能以残缺之文行世。尽管如此，它的主要内容还是基本清楚、完整的。《穆传》一至四卷记述了周穆王从宗周出发，北征犬戎，继而出雁门，入河套，祭河伯，登昆仑，会见西王母，狩猎大旷原，然后返回宗周的经历。穆王此次西征，各地行程总计三万五千里^⑯，所历邦国部族有犬戎、酈人、河宗氏、膜昼、曷口、珠泽、赤乌、曹奴、长肱、剡闾、鸛韩、西王母、智氏、閼氏、胡氏、诸飡、浊繇氏、骨飡氏、重𪚩氏、文山、巨蒐、鬲洩等二十多个，所到之处皆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并且相互赠送物品。由此可见，在周穆王时，西周国力强盛，其势力和影响已远至西域各国。卷五则专记周穆王东巡河南诸地事。他于洧水上接见并宴请许男，于圃田设置十虞之官，筑范宫以观采桑，狩猎擒虎，观夏台，猎苹泽，遇风雪冻人，作哀民诗三章，而后回到别都南郑。可以说是西周天子巡狩中原的实录。卷六原为《杂书》中一篇，名题《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此卷主要记述周穆王东巡河济之间，所宠幸之美人盛姬途遇风寒而夭亡，穆王为之举办

盛大隆重的丧礼事。这也是唯一存今的西周丧制、葬礼的实录。从全书所记述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以周穆王的活动为中心，它详细记录了周穆王整个西征、东巡漫游的具体时间，地点，起止，宿留。只有随行史官才能这样清楚明确地记载帝王的言行举动。这更加证明了《穆天子传》一书珍贵的历史价值。

关于《穆天子传》一书的性质，历代皆把它作为史书看待。如《隋书·经籍志》始载于史部起居注类，两《唐书》仍之。《宋史·艺文志》又列于史部别史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玉海》皆列于传记类。唯清四库馆臣认为它“为经典所不载”^②，故退而列入小说家类。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穆传》性质时却又说：“此书所纪，虽多夸言寡实，然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所谓县圃者，不过飞鸟百兽之所饮食，为大荒之圃泽，无所谓神仙怪异之事。所谓河宗氏者，亦仅国名，无所谓鱼龙变见之说。较《山海经》、《淮南子》犹为近实。”这样一来，《穆传》的性质就有了争议。治史者认为它是史学著作，至少也是历史传记；治文学者则认为它属于小说，甚至是神话小说。也有人把它视作历史地理著作。折衷而论者则以为它是古代历史小说。然而《穆天子传》本身的体例和内容早已明确地告诉人们：它绝不是向壁虚构的小说，更无神奇怪异之处，而是记载周穆王西征、东巡的实录性散文，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

周穆王巡狩、游历之事并非后人所杜撰，而是屡见于古本、今本《竹书纪年》中，先秦其他典籍也有记载。如《管子·小匡》：“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国语·周语》亦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王不听，遂征之”^③。上引数例已足以证明周穆王游行事并非无稽之谈，而实为西周时史实。当然，《穆传》在传入魏国的前后，也难以排除它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已有增删、夺讹之处。但是，从它内容的纪实性，文章手法的简质、完全不饰文采的笔法来看，也绝不应把它视为小说一类。

四、《穆天子传》的文献价值

由于《穆传》是部争议较大的古籍，进而影响到对它的文献价值的认识与使用。随着《穆传》研究的不断深入，它的文献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里仅就前人研究认识所及，对《穆传》的文献价值作些简略的介绍。

（一）历史地理方面

有关西周时期的历史地理文献，保存至今而又确实可信的极为匮乏。人们经常提到的先秦地理著作，不外乎是《尚书》中的《禹贡》篇，还有《山海经》一书。但《禹贡》所涉及的地域，仅止中原九州，而《山海经》又是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书。相比之下，《穆传》所记述的地理概况，特别是西域地理，应当是研究西周时期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穆传》中的史地学价值，突出地表现在周穆王西征的交通路线上。卷一至卷四写周穆王从宗周瀍水出发，经今山西太行山一线，越今河北井陉山，渡漳沱河，出雁门关，进入今内蒙阴山河套地区，然后渡河西行，经今宁夏、甘肃、青海，入今新疆，到达准噶尔盆地，即“西北大旷原”，此为穆王西行终点，停留达三月之久。然后穆王东归，取道东南，经河西走廊，穿今甘、宁沙漠，复至阴山，循来路返回宗周。周穆王此行路程总计三万五千里，所历山川、泽藪、大原、部族、邦国（特别是西域之地），大多不见于别的文献，这既是《穆传》研究中的难题，也是其价值所在。尽管河套以西的具体地域难以用今地考实，但《穆传》中所记沿途风俗人情、物产气候，无疑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穆传》卷五记周穆王东巡河南事，卷六记穆王丧葬盛姬事，其活动范围皆在中原域内。因而穆王所行之地除具体的小地名无法考实外，大致的方位、地形与他的行动路线，还是可以确定的。这也是研究周朝中原地理不可多得的资料。

历代学者对周穆王西征地理的考证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至远者如顾实，他认为穆王西行横跨欧亚两洲，直达华沙平原；至近者如常征，他认为穆王西行不会超出今甘肃、青海一带。日人小川琢治的考证还是比较切合实际一些，他认为穆王西行的终点“西北大旷原”即今新疆天山之南的准噶尔盆地。今人王贻樑亦赞成此说。虽不能因此就说周穆王车辙马迹所至即为西周版图，但起码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早在西周时期，远至今新疆天山一带，已为周朝势力和影响所及。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多年，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数百年以前。因此，长期认为中西交通由张骞“凿空”的说法^②，也由此得到纠正。

（二）古代民族方面

在先秦文献中，有关我国古代民族的资料，以《山海经》所载最为丰富。但其中大多为神话传说，怪异荒诞不足为信。唯《穆传》所载真实而可信，为我们保存了西周时期西北各民族居地、习俗、分布与迁徙等情况，而且大多能从秦汉以后的史籍中得到印证。仅卷一至卷四所载西北部族、邦国就有犬戎、焉居、禺知、酈人、河宗氏、膜昼、容□氏、曷□之人、□之人□吾、赤乌氏、曹奴、长肱之人、□之人潜时、剡閭、鸛韩氏、西王母之邦、智氏、閼氏、胡氏、曷余之人、诸飡、浊繇氏、骨飡氏、重𪚩氏、文山之人、巨蒐之人、纁瑯、纁洩、西夏氏、珠余氏等三十余个（书中脱简、阙文未可知者，尚无法计算在内）。他们都有自己的居地范围、物产，都向周穆王表示了热情友好的欢迎。对于有些部落、邦族的起源、迁徙与演变的记述，更是难得的独家资料。如卷一所记河宗氏部落，这是一个在夏、商、周三代俱为大邦的西北部族。他们长期居住在河套地区，据有黄河上游两岸辽远的土地，阳紆之山为其都居，温谷乐都为其游居，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邦国，与周王朝关系最为密切。它又是周穆王西行的第一站，故穆王以隆重之礼祭祀河伯，并封之为西北诸邦之长。河宗氏国君柏夭还一直伴随穆王，往返于西征路上，既作为开路的先导，亦兼任翻译之职。由此可见，河宗氏除了所居之地连接中原与西域外，还起着联系与沟通

西域各部族的重要作用。

卷二记述：“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丁（其）嬖臣长季绰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此即说明赤乌氏原与周人同一始祖，周人始立国于西土，至古公亶父时赤乌氏与周人通婚，并成为周朝在西域的附属国之一。至于“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鸿鹭之上，以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则是周穆王深入西域后所封的又一属国。

卷三所载西王母之邦，后被人目为神话传说之邦，西王母其人则演变成各种神话人物形象。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保留了母系氏族制的部落，西王母是这个部落的首长或首领的通称。她可能是德高望重之老妇，亦可以是美貌健壮之女王。由于西王母之邦在西域诸国中地位甚高，影响很大，又是穆王西行的最后一站，故穆王“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此部落春秋之后被乌孙人所逐，避入荒寒之青海高原，与其他羌人部落混合而被称为“媯羌”。后遂南下西藏，与唐古拉山之唐羌、牦牛羌等组成一大部落联盟，名曰“唐牦”。因仍行女王、女官制度，《魏书·吐浑传》及《隋书》皆载而名之曰“女国”。此女国女王诸臣，在南北朝末期支持发羌（亦西羌一支）酋长统一西藏高原，建成吐蕃王国。其国号“吐蕃”可能便是“唐”、“发”（读“拨”）两国的合称^{②3}。

卷四载柏夭曰：“重颺氏之先，三苗氏之口处。”此处虽有阙文，但大意仍可明白。它告诉我们：重颺氏的祖先出自三苗。三苗原居中土，《尚书·舜典》称舜“窜三苗于三危”。此三危在何处，旧说不一。《穆传》中所载重颺氏居地正在今甘肃西部与新疆交界一带，那么“三危”在今甘肃敦煌附近的三危山应该是不错的。

至于其他部落与邦国，能从秦汉之后的史籍中寻到踪迹的也不少。如焉居即义渠（焉支、焉耆），禺知即月支（乌氏、虞氏）^{②4}；劓闾之为伊犁，鹯韩之为单桓^{②5}；纛洩或为渠搜之类^{②6}。总之，《穆传》中关于古代民族史的资料是值得今人研究与珍视的。

（三）经济、文化方面

周穆王西征、东巡，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所到之处无不受受到热情友好的礼待。故不能视之为侵略扩张之举，也不能认为是周穆王恣意游乐的浪行。沿途各部落、邦国都向周穆王贡献了土特产，而穆王也对他们有大量的赏赐与回赠。通过这种贡献与赏赐所表现的，不仅是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团结友好关系，而且展示了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壮观景象。沿途各部落、邦国贡献穆王的，多为本地所产马、牛、羊、狗，这说明西域各国大多从事畜牧业生产；有的还贡献美酒、稌米、稌麦等，说明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甚至酿造饮料。周穆王的赏赐多为金银器皿、珠宝玩物、雕彩漆器、朱砂、桂姜，还有大量的丝绸织品，这充分说明西周中期铸造、雕刻、纺织等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以及高超、精美的工艺。由此可见，穆王西行，不仅为西域人民带去了和平与友好，还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与文化知识。并通过东西方的这种交流，促进了双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如卷四载“天子使重颺氏之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显然是把东方冶炼、铸造的工艺传给了重颺氏。春山的棼木华、赤乌氏的嘉禾也由穆王取回，移植于中原。巨蒐人饮白鹄血，以牛羊乳洗足的养生保健之法，也被周穆王摹仿和引用。西周文化的发达还表现在历法的使用上。《穆传》记述穆王的行程与活动，使用的是周正，即以建子之月为岁首，以干支记日法记述了周穆王的所有日程。虽然其中有些因后人整理传抄致误，但仍详细、完整地记录了周穆王西征、东巡的具体日期，这在先秦文献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对《穆传》历法的研究虽代有其人，但至今仍无一致的说法。顾实在他的《穆王西征年历》中认为《穆传》全用周正，而卫聚贤则认为前四卷用周正，后二卷用夏正。就《穆传》所提供的干支记日历法而言，应该说我国历法在西周时即已相当完备、准确了，也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历法提供了实证。

（四）语言、文学方面

汲冢竹书出土之时，本为墨书科斗古文^②，经由荀勖等人整理